
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的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四川省六个村的实地调研

黄丽莉 刘佳 易苗苗¹

（成都理工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背景下，如何构建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与转型，成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以农村社会治理为主线，对四川省六个不同圈层县区的村和农户展开实地调研，运用描述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对社会治理现状及影响因素展开了定量分析，切实研判农村社会治理发展态势。研究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具有明显地区差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财富资本均对社会治理参与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为相关部门制定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政策及建议，为四川省社会治理提供相应的实证依据。

【关键词】农户社会治理参与 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9;D638 **【文献标识码】**A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与转型，成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一直都是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因为“三农”问题关系到我国的民生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基本目标是突破城市和乡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离不开农村的管理机制，因此非常有必要先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村居民的基数大，并且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根本，使得党中央在发展中外格外关注农村地区。近年来，社会治理问题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而农村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它既可能会促进稳定，也可能导致不稳定，城乡发展不平衡不稳定，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构建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与转型，保障农村发展呈现良好的趋势。

农户参与社会治理对实现农村的社会治理创新和转型来说非常关键。加强和创新农村的社会治理，维护和保持农村发展和稳定，需要农户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提高政治参与水平。农户参与社会治理，有效的提高了农户的主人翁意识和农户政治参与的自觉性，使农户具有了学习和创新的观念，能更好的适应当前社会多样化的生活需要。农户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农户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要求，有助于推动农村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增强农户自身的政治认同感。此外，农户参与社会治理，还可以形成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并且会使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增强、执政基础得到巩固，同时也能促

¹**基金项目：**2019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社会治理视阈下四川省乡村振兴的机理研究——基于四川省六个县区实地调研”（S201910616111）。

作者简介：黄丽莉（1999-），女，四川内江人，本科在读；刘佳（1999-），男，四川眉山人，本科在读；易苗苗（2000-），女，湖南娄底人，本科在读。

进农村社会治理的公正公平和健康运作。

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把区域发展问题置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又将西部大开发置于突出位置。四川作为国家西南地区的腹地，在西部大开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一个东富西穷，城乡贫富差距大的国家，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绩效良好就不得不解决不同圈层农村社会治理建设遇到的差异性问题的，研究有效的结合四川省的省情和分阶段的任务，对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天宫村、花果村、眉山市龚村、内江市三柏村、金龟村等六个不同圈层的村落进行实地调研，是助力实现社会治理有效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四川省农村社会治理是我国西南部地区代表，具有很强的创新示范和指导作用，加强对四川省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西南部农村社会治理理论。

1 研究意义

从现实问题来看，四川省农村社会治理步伐滞后给乡村振兴带来了严峻挑战。四川省农村社会治理绩效区域性差异大，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关注度、参与度和满意度均不高，居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水平也有待提高。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绩效良好就不得不解决不同圈层农村社会治理建设遇到的差异性问题的。首先，项目有效地结合四川省农村具体社会治理情况，对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天宫村、花果村、眉山市龚村、内江市三柏村、金龟村等六个村落进行实地调研，是助力实现社会治理有效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其次，通过对村民政治参与现状和社会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厘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富资本等因素对四川省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路径。从村民角度来完善社会治理的政策，在根本上对提高村民本身的素质和参与社会治理水平起着很大作用。同时，对四川省农村社会治理现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提高四川省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对于解决四川省“三农”问题可以起到显著积极的作用，对于推进四川省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起到了典范作用。农村人力资本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明显，直接决定社会治理参与主体的主观意愿程度，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与参与社会治理参与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合作，提高社会效率，有利于调和经济增长与参与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能够优化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财富资本直接影响村民的恩格尔系数以及参与社会治理事务的先决条件。这就形成本文的研究主题，故本项目研究对于四川省农村社会治理有很大意义。

2 社会治理参与现状描述分析

课题组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花果村、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新都区木兰镇天宫村、眉山市东坡区白马镇龚村、内江市资中县双龙镇金龟村及验马镇三柏村六个不同圈层县区的村和农户为调研对象，分别于2019年2月、3月及2020年1月多次下乡调研，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17份。调研着重关注农村社会治理参与方面，通过设置村民自治系列问卷，了解村民对政治的关注度、参与度及满意度等情况。并围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富资本三方面的影响因素对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涉及调研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村干部任职经历、外出务工经历、家中财产、社会治理参与等方面。同时，医疗养老、农产品销售、家庭收入支出、文娱活动等问卷部分，也让我们看到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滋生了种种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已成为实现全面小康和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瓶颈与约束。由于四川省战旗村、龚村、三柏村等是乡村振兴战略与社会治理实施的典型样本村落，对于四川省六个村村民政治参与情况的分析与评价，对了解四川省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参与状况具有“举一反三”的效用。

2.1 社会治理参与度

基层政治建设是社会治理要求之一。社会治理参与的前提是建立在政治关注的基础上，政治关注度越高，才能保证参与水平高。本次调研通过设立调查问卷询问了300户来自6个不同区县的农户（其中成都地区3个，内江地区2个，眉山地区1个）。其中问题包含了“是否了解选举权”“是否参加了选举”“每次换届大会是否参加”“是否成为选举人”四个问题来反应村民的政治关注度以及参与度。调查数据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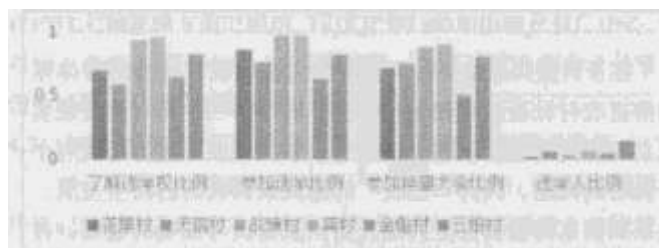


图 1 政治参与度与关注度

表 1 村民民主监督管理的调查情况

变量	花果村	金龟村	战旗村	龚村	天宫村	三柏村
知晓村务公开栏	51.30%	48.30%	99.00%	96.00%	84.00%	84.60%
知晓村的民意收集处	45.00%	51.30%	77.40%	73.30%	54.30%	72.30%
知晓村监督委员会成员以及选举方式	53.50%	53.50%	93.50%	71.20%	58.30%	86.30%
发现村民有违法乱纪行为会举报	38.80%	28.80%	72.00%	32.80%	56.60%	86.00%
发现村干部出现违法乱纪会举报	15.60%	14.61%	85.60%	32.40%	72.00%	54.00%

其中，社会治理参与度与关注度最高的村是成都战旗村。了解选举权的比例达到了 96%，参与选举的人数达到了 96.7%。而最差的村是金龟村，了解选举权人数比例只有 64%，参与选举的比例只有 62.5%。金龟村里，有一部分村民对村委会的选举情况，选举流程没有深刻影响，这间接的反映出金龟村的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过程极大可能流于形式，实际参与效果不佳，真正参与到其中的村民可能只有小部分。

同时，这也反映在村民是否主动发言或者提出意见。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花果村在开会时积极表达自己想法的村民只有 34.7%；在天宫村，这类村民占到了 20%；在战旗村，这类村民占到了 46.8%；在龚村，这类村民占到了 41.9%；在金龟村，这类村民占到了 48%；在三柏村，这类村民占到了 80%。

这一情况说明村民缺乏“自治”意识，在参与了村委员开会或选举的村民中，只有一半左右的村民有自己的想法，正确行使了自己的政治权利。更多村民持有从众心理或者抱有与自己无关的态度来参与。

2.2 政治关注度

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监管和治理。基层政治建设是否完善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民对村委会的管理和监督是否有效。表 1 是六个区县的村名民主监督管理的调查数据。

战旗村的基层民主自治工作卓有成效，而金龟村在基层自治工作上相对较差。不同的自治情况其实也反映了不同地方的基层政治建设的完善性，完善基层政治建设，可以提高村民参与当家作主的自治能力。同时还要构建合理的监管监督制度，让农民们切实感受到自己参与政治活动能够真正保证到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农民的政治认知改进，提高农民的政党认同感。

2.3 政治满意度

近年来四川省各地区更加关注农村德治建设工作，在全省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移风易俗等为主题开展乡风文明活动，

引导村民转变固有思想观念、摒弃陈规陋习、树立积极的价值观，使农村地区崇德向善、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愈加浓厚，农村整体社会文明的水平有很大提升。所以，我们选取文化道德建设活动开展率和村民对其满意度两个指标对德治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分析。

表 2 政治满意度的调查情况

县区/指标	文化道德建设活动	对村干部文化道德活动
	开展率	开展的满意度(1~5 分)
郫县战旗村	93.75%	5.00
新都天宫村	23.33%	2.37
龙泉花果村	26.09%	3.13
眉山丹棱龚村	96.77%	4.00
内江三柏村	81.82%	4.51
内江金龟村	29.17%	2.59

通过对四川省六个区县的实地调研，文化道德活动开展较好的战旗村、龚村、三柏村文化道德活动开展率达 80%以上，横向比较六个区县的德治建设情况，在文化活动开展较频繁的地区，村民对村干部在德治工作中的满意程度更高，形成道德风气浓厚的氛围。在调查走访过程中，我们得知战旗村在德治建设中积极开展文化道德活动，例如开办道德讲堂、乡村道德评选活动，村民收获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的同时，更为推动四川省德治体系的完善起到了引导表率作用。近两年来，村民对村干部在道德活动中开展的满意度达到 5 分，村民的政治参与度和生活幸福感显著提升。而龚村则非常注重在特色文化院落的建设，以基础设施的完善推动道德文化治理活动的开展。同时，村民也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去维护村规民约。这生动的体现了新时代农村居民对基础建设满意、制度满意、治理有效满意，治理绩效给出了村民一个满意的答复，对四川省农村德治体系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

3 社会治理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 计量经济模型设定

学者们在研究公民社会治理政治参与时，常常会将公民的资本列为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是由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等要素构成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通常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使分散的个体聚集，从而增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对政府治理有积极意义。

表 3 反映村民社会治理政治参与的影响变量

类别	变量	测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力	年龄	18~29 岁=1, 30~39 岁=2, 40~49 岁=3,	3.568	1.812
		50~60 岁=4, 60 岁及以上=5		
资本	性别	男性=1, 女性=0	0.787	0.028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学历=1, 高中=2, 大专以上=3	1.325	0.966
	是否为党员?	是=1, 否=0	0.068	0.017
社会	是否当过村干部?	是=1, 否=0	0.070	0.018

资本	是否在县外打工?	是=1, 否=0	0.131	0.023
	是否参加集体管理事项?	是=1, 否=0	0.267	0.030
财富	农业收入	—	7536.701	746.067
	非农收入	—	26685.909	5349.193
资本	城镇购置房产面积	—	5.050	1.809
	家中耐久消费品（小汽车）	—	0.280	0.036

表 4 农民社会治理政治参与的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P
人力资本	年龄	0.002833	0.001108	2.557866	0.0112
	性别	0.717	0.138	17.243	0.0745
	受教育程度	0.02925	0.007647	3.824938	0.0002
社会资本	是否为党员?	0.672	0.14	21.486	0.0034
	是否当过村干部?	0.147	0.227	7.165	0.04
	是否有外出（在本县以外）务工经历?	0.053	0.716	22.405	0.0076
	是否参加集体管理事项?	0.231	0.212	12.787	0.037
财富资本	农业收入	0.022	0.13	18.905	0.051
	非农收入	0.041	0.51	26.405	0.0053
	城镇房产面积	0.012	0.002	7.287	0.00786
	耐久消费品（小汽车、大型农机等）	0.127	0.122	11.361	0.03

鉴于此，控制其他因素（例如，除资本外的农户其他家庭特征、区域性经济条件等）来建立 Probit 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对村民的社会治理政治参与是否有显著影响。由于农户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富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关关系，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即可能导致分析系数出现偏误，运用以下思路构建了农村社会治理参与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

具体模型如下：

$$y_{ijk} = \alpha_0 + (\beta_0 + \beta_1 D_k) R_k + \beta_2 S_k + \beta_3 C_k + \varepsilon_{ijk}$$

模型中的因变量 y_{ijk} 表示农村社会治理参与（1=是，0=否），在问卷中以“每次换届大会是否参加来反映”，在选择自变量时，我们将资本作为自变量。RK 指的是涉及人力资本的一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和文化水平三项指标；将文化水平中受教育年限高作为对照组，其余两类均为处理组。设定这个人力资本变量的关键在于：①受教育年限对社会治理参与是否有显著影响？②了解较高受教育年限的村民相较于较低受教育年限是否存在差异性参与概率。社会资本力：用政治面貌、是否为村干部、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是否参与集体管理这四项指标表示，设定这四个关键变量在于：①代表社会资本的政治面貌、是否是村干部、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是否参与集体管理对社会治理参与是否有显著影响？②了解在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时，党员、村干部经历、有外出务工经历、参与村集体事项更多的群体是否做出差异性的适应反应？财富资本 4 我们采用了农户收入来源、城镇购置房产面积和家中耐久消费品拥有情况作为虚拟变量。将农户收入分为较高收入、中等收入及较低收入组三类。较高收入组作为对照组，其余两类均为处理组。设定这三个关键变量在于：①财富资本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是否有显著影响？②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时，较于较高收入群体，中等及低收入群体会有怎样差异性反应？模型主要想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财富资本对农民参与社会治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农村社会治理的难易水平是否有较大差别？异质性群体（不同性别、不同收入、不同学历等）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是否一致？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的对社会治理参与频率是否有显著的增加？有关影响社会治理政治参与的变量见表 3。经过模型分析与检验，得到计量分析的结果见表 4。

3.2 实证结果分析与探讨

由表 4 可以看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力资本变量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变量对社会治理参与变量的影响均显著，性别不显著，性别因素系数为 0.717，说明在农村社会治理参与中男性比女性高出 7.17%，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更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系数分别为 0.002833、0.717、0.02925，反映出村民在这三个因素对社会治理参与程度的影响都较大，其中受教育年限是决定农民社会治理参与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而社会资本变量中是不是党员、是否当过村干部、是否参与村集体管理事项及是否外出务工与农村治理参与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72、0.147、0.231、0.053，显著性水平为 0.0034、0.04、0.037、0.0076，小于 0.05，所以是不是党员、是否当过村干部、是否参与村集体管理事项及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与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关系为正向较强相关，党员、村干部、参与村集体事项频率更高和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频率更高。财富资本变量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是否在城镇购置房产及是否购置车辆与社会治理参与系数分别为 0.022、0.041、0.012、0.127，显著性水平为 0.051、0.0053、0.00786、0.03，除农业收入外都小于 0.05，因此农业收入、城镇购置房产、家中耐久消费品与社会治理参与行为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农业收入水平高、家中购置有房产和车产的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更高。而非农收入水平与样本不相关，因此对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没有影响。具体进行分析，我们选取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郫县天宫村、龙泉花果村、眉山龚村、内江三柏村、内江金龟村六个村。收入较高的村民由于接触的外界事物较多，更倾向于投入社会治理建设中；而收入较低的村民则表示没有过多精力去参与社会治理。另外，受教育年限高的村民的知识水平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保证了其在政策变化的时候会积极表达诉求，在社会治理参与过程中会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同时发挥主人翁意识提出建议，并希望得到采纳；反之，在受教育年限有限的情况下，村民主动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积极性较低。当然，党员一般比普通群众更积极参与治理活动，所以政治面貌对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也较显著。

人力资本体现劳动者自身可以影响其获取报酬的资本，例如性格、知识技能、文化水平等。在表 4 中，体现人力资本的三个变量对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02833、0.717、0.02925，系数均值为 0.250，这说明人力资本每提高 1%，则社会治理参与行为较相邻层级提高 25.0%，表明村民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水平提升起很大作用。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性别对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不大，但实际上反映了性别对村务决策的影响也是存在的。由此，要想提高农民的社会治理参与，也需加强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本文用政治面貌、是否当过村干部、是否参与村集体事务、是否外出务工来代表社会资本。（1）政治面貌。结果显示（见表 4），政治面貌与农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672，显著性水平为 0.0034，小于 0.05，说明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与其是否是党员有关，党员的社会治理参与度高于群众。（2）是否当过村干部。村民是否当过村干部与其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47，显著性 0.04，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因此是否当过村干部对其社会治理参与具有显著性影响，即有过村干部任职经历的村民其社会治理参与相对也越积极。（3）是否经常参与村集体活动。经验表明，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在利益博弈格局中被边缘化，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底层化。农民单个的参与行为既增大了农民参政的成本，也钝化了国家整合社会的能力。有鉴于此，本文以村集体事项的参与度来考察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其农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平时经常参与村集体活动的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频率也更高，从不参与村集体活动的村民也几乎都没有参与社会治理。村民是否经常参与村集体活动的系数是 0.231，因此是否经常参与村集体活动对其社会治理参与具有显著性影响，即越喜欢参加村集体文化体育等活动的村民参与社会治理也越积极。

综合四川省六个区县的实际情况，农村居民的财富在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房产、耐久消费品这几方面的代表性更高，所以财富资本用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房产和耐久消费品四个方面来反映。这四个问题的答案设置也是得分越高，说明财富资本越大。在表 4 中，体现财富资本的四个问题对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22、0.041、0.012、0.127，系数均值为 0.0505，

这说明财富资本每提高 1%, 则社会治理参与行为较相邻层级提高 5.05%。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人力资本的平均值大于财富资本的平均值, 说明人力资本对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要强于财富资本, 可见财富资本的提升无疑同样也会促使社会治理参与程度有所加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除了显著影响社会治理参与的人力资本变量之外,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财富资本都对社会治理参与有一定影响。因此, 从影响社会治理参与的因素出发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就可以达到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成效。

4 提高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措施

由四川省六个区县的调研结果可以看出, 西南部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关注度、参与度和满意度均不是很高都存在不足的部分, 由此反映出西南部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限, 但研究发现社会治理水平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改善, 所以西南部农村社会治理还存在较大的提升潜力。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来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资本及社会治理参与的关键变量, 由此加强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

4.1 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是影响农民社会治理参与的关键因素, 也就是说农民的文化水平会直接影响其自身对于社会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和满意度, 受教育年限高的农村居民在社会治理参与的过程中有较高的参与度, 会提出更好的建议。因此, 除了要加强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 确保农村居民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还需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居民的职业技术水平, 并由政府组织统一的技能培训, 对农民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讲解教授。同时定期开展有关农村基层自治制度内容的宣传和培训, 城乡建设与发展培养农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以此来达到提高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目标。

4.2 促进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

根据调研结果发现, 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越高, 其参与社会治理越积极, 所以多渠道增加村民农业收入, 可以增加村民经济资本, 有助于提升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 促使村民成长为社会治理的真正主体。但大部分农村居民因征地拆迁不以务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而采取其他方式维持生计, 可非农业收入水平并不影响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此外, 中青年劳动力流动性较大, 他们常年在外务工, 因此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 农业种植常以家庭为单位独立进行收入不高。并且, 农村留守人口绝大多数是儿童和老人,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能力的提高。因此, 大力推动村民种植本土特色农产品, 促进多种多样的农民合作组织成立, 大力发展电商农业经济让青年劳动力能在家乡找到适宜的工作, 大幅度提高村民的农业收入水平。

4.3 加强农村的组织建设

根据研究数据表明, 村民的社会资本积累的越多, 其社会治理参与度越高。加强农村组织建设发展真正代表村民利益的社团组织, 鼓励村民参与农村合作经济或社会组织, 扩大村民自身组织网络, 提高参与和博弈的能力, 积累社会资本。在参与组织活动的过程中, 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 行使自己的权力和义务, 参与组织内的活动本身就是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孔政.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对策[J]. 安徽农业科学, 2016, 44(07):283-284+293.
- [2]候真明. 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4(06):218-219.
- [3]柯风华. 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福建漳州的实证[J]. 大连干部学刊, 2019, 35(10):46-53.

[4]任映红,荆琦.村落文化情境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兼析 H 村村治变迁中的文化因子[J].浙江社会科学,2013(07):98-03+114+158.

[5]李晓宁,李雪峥,崔健.西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分析——基于陕西省岐山县 G 村的社会调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1):107-114.

[6]陈成文,王修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来自长沙市的一项实证研究[J].学海,2004(06):70-75.

[7]陈琳,袁志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99-113+124.